

皇家
读本

张居正讲评
ZHANG JU ZHENG JIANG PING LUN YU

论语

修订本

陈生玺等
译解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013069380

B222.2
06-2

皇家
读本

张居正讲评
ZHANG JU ZHENG JIANG PING LUN YU

论语



陈生玺等
译解



北航

C1676944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B222.2
06-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居正讲评《论语》皇家读本/陈生玺等译解. —
修订本. —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3. 8

ISBN 978-7-5326-3978-6

I. ①张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儒家②《论语》—研究
IV. ①B22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44422 号

责任编辑 郁 蕙

装帧设计 多 吉

张居正讲评《论语》皇家读本(修订本)

陈生玺等译解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辞书出版社

(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电话: 021-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 毫米×1070 毫米 1/16 印张 21 字数 400 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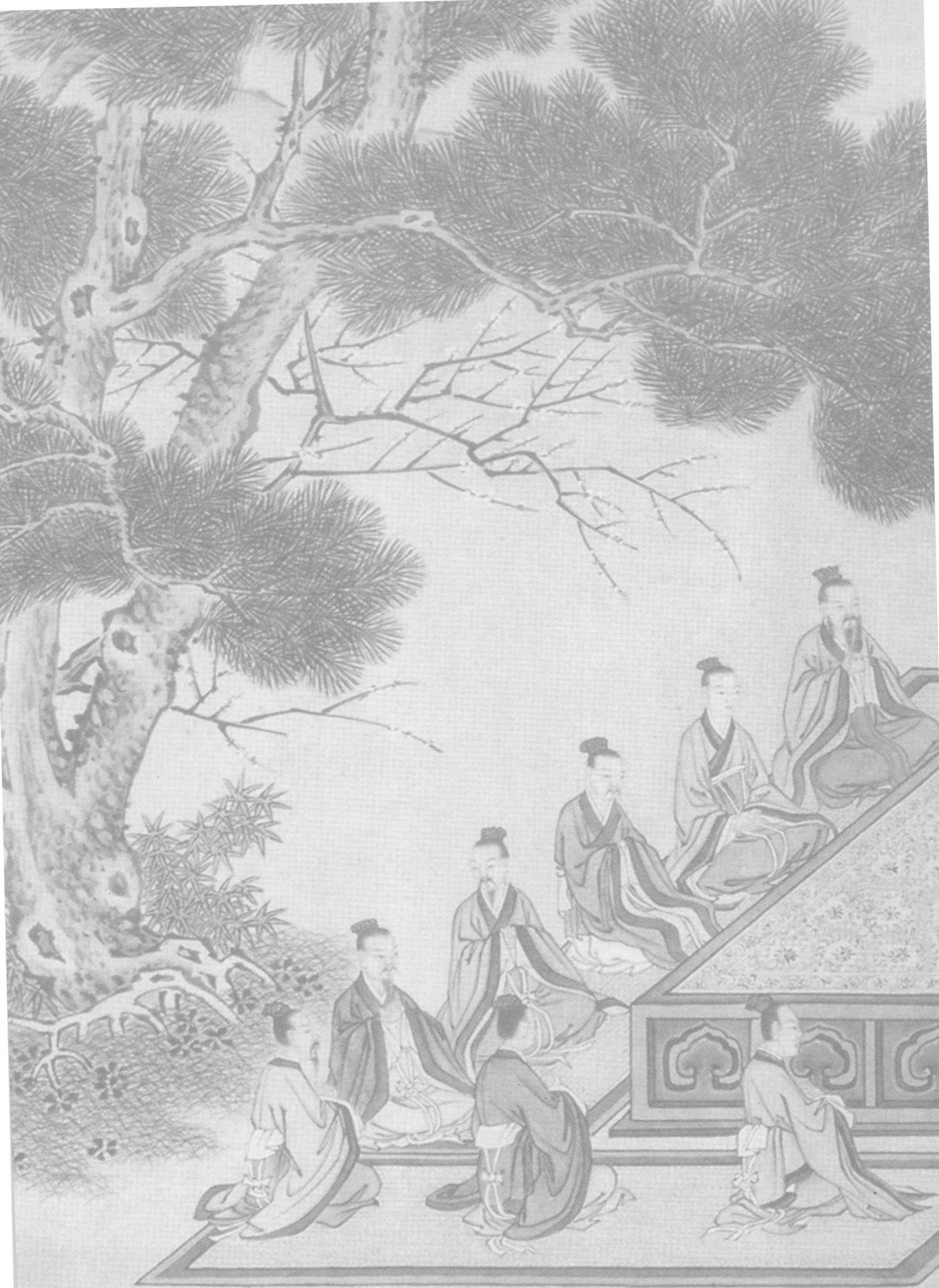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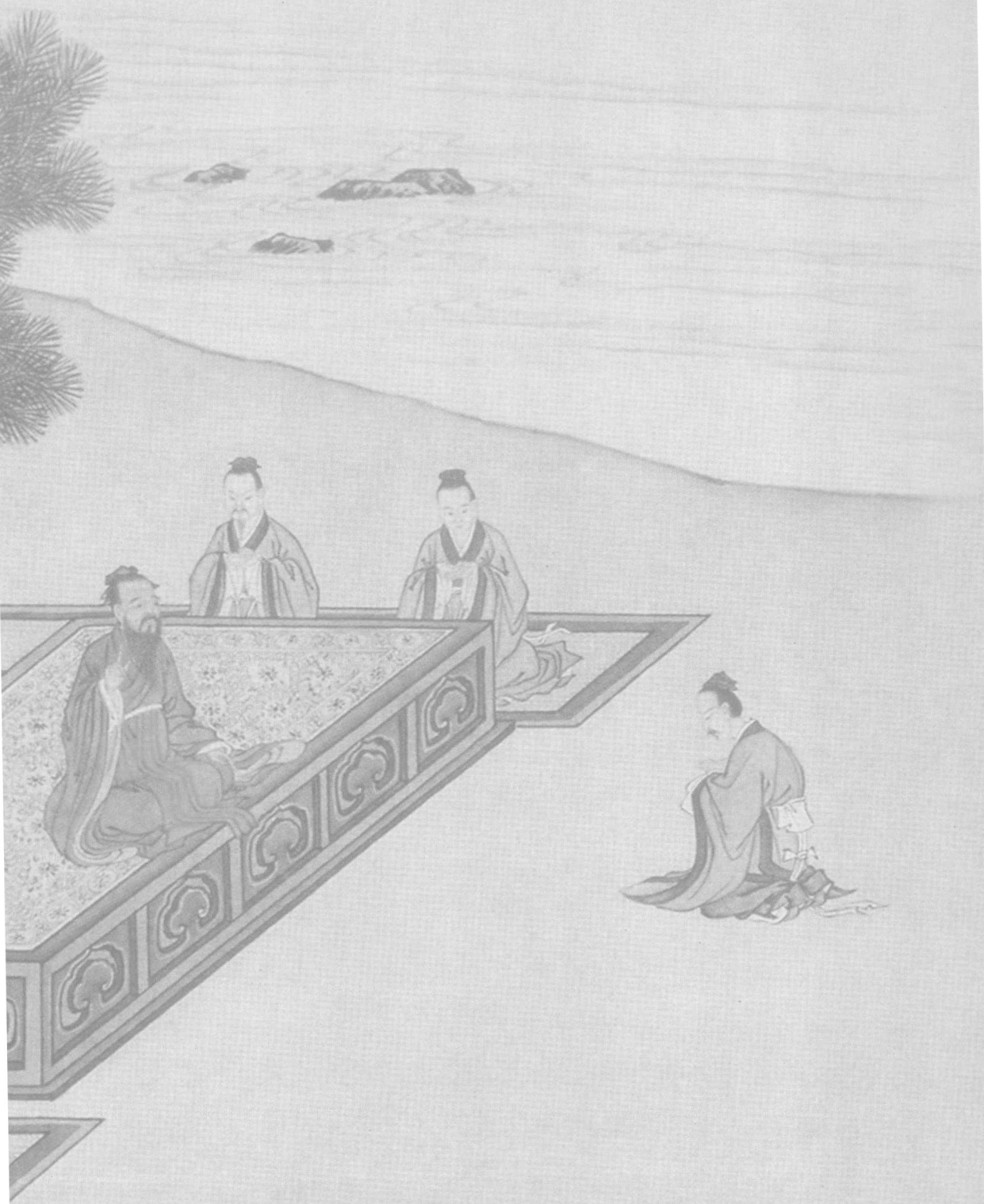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26-3978-6/B·243

定价: 42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联系电话: 021-63244086





主 编

陈生玺

副主编

贾乃谦

编 者

贾乃谦 张长法

王淑艳 康 华

用历史的观点解读《四书》

陈生玺

“文革”时期的“批林批孔”和“评法批儒”把中国的历史完全弄颠倒了，当时全国上下从电台、报纸、大中小学课堂、工厂车间、农村田间地头，都要批判孔子，好像中国现实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两千年前的孔子而来。在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运动之下，虽然没有起到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效果，但也确实把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搞乱了。尤其是当时的年轻人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的普通群众，这种先入为主、反复灌输的方式，给人们潜在的意识里打下了深刻的印记，流毒极为深远。“文革”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，但当人们提到孔子或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时，大多数人乍一听到便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定，甚至挑毛病，调侃揶揄，张口闭口“孔老二”云云。所以今天我们重读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经典著作，如何恢复它的本来面目，从而理解它的真实意义，仍是学界一项重大任务。例如《四书》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作品，自秦汉以后乃为士子常读和必读之书，是社会的主流意识。尤其是宋元以后，将其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，不仅上自中央的国子监，下至府州县学以及乡村私塾，凡是读书者人人必读，就是最高统治层的皇家，皇帝本人和皇子们也要读。这部明代《四书》皇家读本，就是明代万历初年(1573—1582年)大学士张居正协同翰林院的讲官给皇帝朱翊钧讲解《四书》的讲章，经修改后进呈皇帝在宫内阅读，定名为《四书直解》。由于朱翊钧初即皇帝位时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子，所以这本讲稿用最通俗的明代白话文写成，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，在今天仍不失为初读《四书》一本较好的辅助材料，我们将它整理出来献给读者。但因过去长时间极左思潮对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思想的歪曲，先定性，后分析，摘其所要者大加挞伐，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。所以今天我们重读《四书》时，首先应该摒弃这种新传统的偏见。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于1930年审查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时曾说：“对于古人之学说，应具了解之同情”，“所谓真了解者，必神游冥想，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，而对于其持论，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，表一种之同情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，而无隔阂庸廓之论。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，与今日之情势迥殊，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？”(见冯友兰《三松堂集》)这就是说，我们对古人的著作，应该设身处地了解其所处之历史环

境,同时也把自己融入这种环境之中,以此来理解古人,才能评论他的是非得失。因此,我们觉得有必要按照《四书》的原意,将《四书》中的一些基本要点简要地介绍给读者,让读者按照《四书》作者的原意来理解《四书》,而不是以今天的是非观念来理解《四书》。因为我们今天与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完全不同,是非观念亦不大相同,例如孔子讲君君、臣臣,今天我们是共和时代,人人都是平等的,若是按照今天的观念去看古代,那不是觉得太可笑而不可理解了吗?

《四书》包括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四部著作,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秦汉以后,都以单行本行于世,汉文帝(前179—前157年)曾对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尔雅》各设博士官,称“传记博士”。汉武帝建元五年(前136年)设五经(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)博士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乃小戴《礼记》中之两篇著作,《礼记》乃六经(五经加乐经)之一,亦置博士官。所以从汉代开始,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都是当时宫廷和士子必须研读之书。到宋代程颢、程颐将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从《礼记》中抽出,予以整理,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合在一起,按照他们所理解的为学进德次序,先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次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称为《四书》,定为学者学习入德之门。朱熹(1130—1200年)以毕生精力加以注释,称《四书集注》,《四书》之名自此确立。元代皇庆二年(1313年),元仁宗下令元朝也仿唐宋制度实行科举取士,规定考试题目必在《四书》之中,发挥题意即以朱注为依据,直到明清两代,六百年相沿未改,所以《四书》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思想影响极大,必须加以认真研究。

2006年10月

绪言

陈生玺

《论语》是孔子的言论辑录。孔子(前551—前479年),名丘,字仲尼,春秋时鲁国人,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和教育家,五十岁后曾任鲁国中都宰、司空、司寇等职,后曾周游宋、卫、陈、蔡、齐、楚等国,不得任用,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。《论语》一书是孔子死后由其弟子辑录他的言论而成,所以反映孔子的思想极为广泛,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宝库之一。

教育 我国古代学在官府,孔子是第一个开办私学,把文化从贵族传播给普通人民的教育家,所以他特别重视教育,《论语》开篇第一句就是:“子曰: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学了要时时复习,不也很愉悦吗?有朋友自远方来,不也很愉悦吗?人家不了解我,我却不怨恨,不也是君子吗?这充分反映了孔子对学习的态度:酷爱、谦虚和认真。他总结自己一生的学习经验: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十五岁立志于学习,三十岁就有自立的成就,四十岁就通达事理,五十岁就懂得了天时命运,六十岁听言后即能知其旨意,七十岁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能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。他说他不是生而知之,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勤于学习。“十室之邑,必有忠信如丘者焉,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他的一切成就都是从学习中得来的。

孔子的教育思想是“有教无类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,人无分富贵贫贱,他都能给以教育,他说:“自行束脩以上,吾未尝无诲焉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只要给我十条干肉(见面礼)我从来没有不收他为学生进行教育的,所以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者居多。他的教育方法是因材施教,“循循善诱”,有步骤地引导而诲人不倦。“子曰:不愤不启,不悱不发,举一隅不以三隅反,则不复也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教导学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时不去开导,不到他想说出而不能时不去启发,举一通而不能推知其他三方面,就不必再重复教了。他认为学习对一个人非常重要,不仅是学知识,而且也是学做人。“子曰:德之不修,学之不讲,闻义不能徙。不善不能改,是吾忧也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德行不修养,学问不讲求,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实行,错误不能改正,

这些都是我忧虑的。在他的学生中,他认为颜回最好,一次鲁哀公问:“弟子孰为好学?”孔子答说:“有颜回者好学,不迁怒、不贰过。不幸短命死矣,今也则亡,未闻好学者也。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他之所以称赞颜回,是因为颜回学习之后品德有所提高,“不迁怒”,不拿别人出气,“不贰过”,犯过的错误不再重犯。“子以四教: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孔子教育的科目是:历史文献、行为实践、待人忠心、与人交往信实。文,包括诗、书、礼、乐。

仁与忠恕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。仁的象形原是两人相向而坐或立,汉代郑玄训为“相人偶”,即两人互相存问之意。所以仁的本意为人要互相亲爱和帮助。“樊迟问仁,子曰:爱人。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仁就是爱人,“子曰:弟子入则孝,出则弟、谨而信,泛爱众,而亲仁。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青年人,在家孝顺父母,出外敬爱兄长,行为谨慎,说话诚实,广泛亲爱大众,亲近有仁德的人。这里的爱人,是广泛的爱,没有贵贱等级的限制。“仲弓问仁,子曰:‘出门如见大宾,使民如承大祭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,在邦无怨,在家无怨’。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仲弓有管理之才,所以孔子对他说:出门好像迎接宾客仪容整肃,役使老百姓好像承担大的祭祀谨慎慎重,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施加于别人,身在工作岗位没有怨言,回到家也没有怨言,这就是仁了。“子贡问曰: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?’子曰:‘其恕乎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’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这里很明确地说可以行之终身的就是恕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在另一处,子贡又问:“‘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,何如?可谓仁乎?’子曰:‘何事于仁,必也圣乎!尧舜其犹病诸!夫仁者,己欲立而立,己欲达而达人,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’。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子贡说:假若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,算不算仁呢?孔子说:何止是仁,简直是圣人了,尧舜可能都难做到。至于仁,就是自己要立身于世,也要让别人立身于世,自己想通达于世,也要让别人通达于世,能够以自己为例而想到别人,这就是实现仁的方法了。这里明确提出实现仁的方法,就是要从自身出发,推己及人。一次孔子对曾子说:“参乎!吾道一以贯之,曾子曰:唯!子出。门人问曰:‘何谓也?’曾子曰:‘夫子之道,忠恕而已矣。’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参啊!我的思想是一贯的。曾子回答说:是!孔子出去之后,门人问曾子是什么意思?曾子说:夫子的思想就是忠和恕罢了。由此可见,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就是爱人,分而言之就是忠和恕。恕是要求自己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忠是对人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。”

但孔子讲仁,也是有原则的。“子曰: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。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喜爱某些人、厌恶某些人。

孔子对仁的要求是相当高的,一个人部分地做到仁是可以的,但要全面做到仁则相当不易。一次鲁国大夫孟武伯问孔子:子路仁吗?孔子回答

说：“不知也。”又问，孔子说：“由也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赋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子路可以在有一千乘兵车的国家里管理财政，但是否仁，我不知道。又问冉求如何？孔子说：“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为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冉求可以在有千户人家的地方做一个县长，百乘之家的封地作个总管，但他是否仁，我不知道。又问公西赤怎样？孔子说：“赤也束带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公西赤穿着礼服，可以在朝廷接待宾客，至于是否仁，我不知道。连子路、冉求、公西赤这样各有所能的大弟子都不能算作仁，可见为仁之难。孔子最喜欢颜回。他说：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颜回在心里三个月不违背仁，其余的人也只能每天每月想起仁罢了。

孔子讲仁，都是有所为而为之，不是讲空话。针对当时的人事政治，“子张问仁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‘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。’请问之。曰：‘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’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能够作到这五件，庄重不会受到轻蔑，宽厚会得到众人的拥护，诚实信用会得到别人的任用，敏捷勤快做事会有成效，慈惠能够使唤动人，也就是仁了。这是针对当时的为政者而言，相当具体。

仁与礼 仁与礼是不可分的。孔子主张复周礼，因为周代初年是古代的盛世，周礼是参照夏、殷两代的礼制而订立的。春秋时的各诸侯国是由周王朝授封而来，当时列国的纷争战乱不已。孔子认为都是由于周室衰微，诸侯不尊周礼，所谓礼崩乐坏，所以他主张复周礼。“颜渊问仁。子曰：‘克己复礼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！’颜渊曰：‘请问其目。’子曰：‘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。’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对于同一个问题，孔子针对不同的人的提问，便有不同的回答。颜渊是孔子认为学习和品德最好的学生，能够坚持仁，所以这个回答着重在复礼。但复礼的途径则是克己，去除自己一切违反周礼的思想和行动，完全在于自己，而不在于他人。不合周礼的东西不看、不听、不说、不做。因为仁是思想品德，是内在的，礼是节仪制度，是外在的。“子曰：‘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’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人若无仁德，礼有什么用呢，人若无仁德，乐有什么用呢？“子曰：‘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’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礼呀，礼呀！仅仅是玉帛之类的礼物吗？乐呀，乐呀！仅仅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？从当时礼崩乐坏的情势而言，孔子所说的复礼，仁是内容，礼是形式，仁是体，礼是用，两者有时互为表里。

一次孔子与子夏讨论《诗经》，“子夏问曰：‘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。’何谓也？”带酒窝的笑脸多好看啊，美丽的眼睛黑白分明，洁白的底子上面画着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“子曰：‘绘事后素。’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先有白

色的底子,然后画花。子夏问:“‘礼后乎?’子曰:‘起予者商也,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’”那是不是礼乐产生于仁义之后呢?孔子说:启发我的是卜商,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了。这里也明确说明了先仁义而后礼乐的关系。孔子虽然主张恢复周礼,但周礼已是历史的过去,无法恢复,而孔子对后代最有影响的则是他以仁为核心的忠恕思想。他肯定了人的独立意志和人格的价值,人在思想道德上不属于贵族,也不属于神。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一国的军队可以夺去它的主帅,一个普通的平民不可以夺去他的志向。

礼之用和为贵。“有子曰:‘礼之用,和为贵,先王之道斯为美,小大由之,有所不行,知和而和,不亦礼节之,亦不可行也。’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礼的运用,以达到和谐为贵,古圣先哲治国之道的可贵之处,就是在于和,无论大小的事都要达到和,如有行不通的地方,还一味地为和而和,而不用礼来加以节制,也是不可行的。这是说礼之运用贵在于和,这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而来的,和不是为了和而和,而是有一定的原则即礼,和中也包含着异。“子曰:‘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合。’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君子的和不是盲目附和,小人只盲目附和而不是真正的和。和的标准即中庸之道的“无过”和“不及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不要超过也不要达不到,要恰到好处。

为政 孔子是主张德治而反对刑治的。“子曰:‘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’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用政令来引导人民,用刑罚来管理他们,人民虽然免于犯罪,但没有廉耻之心;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民,用礼制来管理他们,人民有了廉耻之心,而且情愿归服,这是孔子关于为政的总原则。他反对统治者单纯用刑罚来强迫人民服从,主张用关心人民疾苦的道德来争取人民自愿的服从,这样统治才能长久。“子曰:‘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’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用道德治理国家,自己好像北极星一样,在固定的位置上,有众多的星辰环绕着自己,这就是德治的好处,但德治的原则必须是统治者实行善政,以身作则,事处处做人民的表率。“季康子问政于孔子,曰:‘杀无道,以就有道,何如?’孔子对曰:‘子为政,焉用杀。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,小人之德草,草上之风必偃。’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季康子想杀掉无道之人而接近有道的人。孔子回答说:用不着杀人,只要你想给人民做善事,人民也就自然跟着善了。君子的德行好比风,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,风向哪边吹,草就向哪边倒,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道德的感化作用。

“季康子问政于孔子,孔子对曰:‘政者正也,子帅以正,孰敢不正。’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政治就是端正,你自己带头端正,谁还敢不端正呢。当时鲁国公室衰弱,大夫季氏专鲁国政,季康子贪财增赋,已属不正,所以孔子如此

回答,要他率先端正自己。“子曰:‘其身正,不令而行,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’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为政者自身端正,就是不发命令老百姓也能跟着实行,若自身不端正,即使有严厉的命令,老百姓也不顺从。这就是为政者行为表率的作用,政令必须和自己的行为一致。

君臣关系 古代是君主制,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君主,其他人都是臣民,如何确立正确的君臣、上下关系极为重要。鲁昭公二十五年(前517年)孔子在齐国,“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:‘君君、臣臣,父父、子子。’”公曰:‘善哉!信如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,虽有粟,吾得而食诸?’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说:做君的要像个君,做臣的要像个臣,做父亲的要像个父亲,做儿子的要像个儿子。齐景公听了说:好啊!要是君不像君,臣不像臣,父不像父,子不像子,虽然有粮食,我能吃得着吗?这是因为当时齐国大夫陈氏专齐政,有不臣之心,威胁到齐景公的君位。孔子是反对以下犯上、以臣弑君的,所以齐景公有此发问,而孔子有此回答,这是针对齐国的特殊情况而讲的,并不是无条件的强调君主的权力。鲁哀公十四年(前481)陈恒果然杀了鲁简公。

正名 鲁哀公七年(前488年)孔子在卫国,子路问孔子,卫君若请你帮助治理国家,何者为先。孔子回答说:必先正名。“名不正,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,事不成,则礼乐不兴,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,刑罚不中,则民无措手足。故君子名必可言也,言之必可行也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这是说,名分地位不正,言词就不顺当,言词不顺当,事情就办不成,事情办不成,礼乐制度就建立不起来,刑罚就不会得当,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。所以君子使用的名义必须讲得出道理,能讲出道理必定能行得通。这是强调名分的重要性,名实应该相符。当时卫国的政治混乱,卫灵公在位时南子专政,太子蒯聩出逃至赵,卫灵公死后,立蒯聩之子辄继位,是为出公。诸侯欲送蒯聩入而夺位不得,所以君臣名分不正。孔子强调正名,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讲的。孔子虽然重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,但他是很有原则的。“定公问:‘君使臣,臣事君,如之何?’孔子对曰:‘君使臣也以礼,臣事君也以忠。’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鲁定公问,君主使用臣子,臣子服事君主,应该怎样呢?孔子回答说,君主应该以礼来使用臣子,臣子应该以忠心来服事君主,两者互为条件,君主若不采纳臣下的正确意见,臣下就可辞官而不臣。鲁定公十四年(前496年),孔子为鲁国司寇,“齐人归女乐,季桓子受之,三日不朝,孔子行。”(《论语·微子》)齐国怕鲁国重用孔子,送来女乐给鲁国,季桓子接受了,三日不朝,孔子看到自己的主张不能实行,就辞官走了。孔子并不赞成对君主绝对服从的愚忠。

为政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,富而后教。“子适卫,冉有仆。子曰:‘庶矣

哉!’冉有曰:‘既庶矣,又何加焉?’曰:‘富之。’曰:‘既富矣,又何加焉?’曰:‘教之。’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孔子到卫国,冉有驾车,孔子说,人口多稠密呀!冉有说:人口已经很多了,又该怎么办呢?孔子说,让他们富裕起来。冉有说:已经富裕了,又拿他们怎么办呢?孔子说:教育他们。教育就是使老百姓增加知识和提高道德品质。

针对当时的情况,如何从政才能把国家治理好,子张曾问孔子,孔子回答说:“尊五美,屏四恶,斯可以从政矣。”(《论语·尧曰》)什么叫五美?孔子说:“君子惠而不费,劳而不怨,欲而不贪,泰而不骄,威而不猛。”给人民以好处却不劳费,劳动百姓他们却不怨恨,爱好仁义而不贪得,庄重而不骄傲,威严而不凶猛。什么叫四恶,孔子说:“不教而杀谓之虐,不戒视成谓之暴,慢令致期谓之贼,犹之与人也,出纳之吝,谓之有司。”(《论语·尧曰》)即不加教育便行杀戮叫做虐,不事先申诫便要求成效叫做暴,起先懈怠突然限令期限叫做贼,同样是给人财物,出手吝啬,叫做小家子气。针对当时齐、鲁、卫等国的政情,只有崇尚这五种美德排除这四种恶政,才能把国家治理好。

士 孔子出身于士,所以很重视士的品德。士,指一般读书人。“曾子曰:‘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,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,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’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读书人不能没有刚强的毅力,他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,以实现仁为己任,不是很沉重吗?只有到死才能停止,不是很远吗?“子曰:士志于道,而耻恶衣恶食者,未足与议也。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读书人立志于真理,而以粗衣恶食为耻,就不值得和他谈论道了。“子张曰:‘士见危致命,见得思义,祭思敬,丧思哀,其可已矣。’”(《论语·子张》)士遇到危险时肯献出生命,见到有所获得时考虑是否合乎道义,祭祀时要想到严肃恭敬,居丧时要思念悲痛,这样就可以了。可见士是立志于追求真理,不怕穷困,具有坚强的毅力,勇于担当社会的重大责任,为了道义,遇有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。

君子与小人 君子有时是指在上位的统治者,小人指地位低下的劳动民众,但在广泛的意义上君子是指有道德和道德高尚的人,小人是指没有道德或道德很少的人,不分社会阶级地位。“子曰:君子坦荡荡,小人常戚戚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君子胸怀宽广,小人经常局促忧愁。“子曰:君子上达,小人下达。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君子通达道义,小人通达财利。“子曰:君子周而不比,小人比而不周。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君子和人团结而不勾结,小人和人勾结而不团结。“子贡曰:君子之过也,如日月之食焉,过也人皆见之,更也人皆仰之。”(《论语·子张》)君子有了过错,好像日食和月食,人人都能看得见,改正时,人人都仰望着。“子夏曰:小人之过也,必文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小人对自己的过错,必定掩饰。具体而言,在当时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君

子呢？“子曰：君子以义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！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君子做事以正义为根本，以礼来实行它，用谦逊的语言说出，用诚实的态度去完成他，这就是君子啊。孔子关于君子小人的界定对后代的道德教育影响很大。

2006 年 12 月

编辑说明

一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合称《四书》，是儒家思想的经典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著作。从汉代以后便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，士子和社会各阶层常读和必读之书。到了明清时代，又被定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，所以《四书》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影响极大，这除了历代统治者的提倡以外，主要还在于它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容，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生活现实和人们认知的价值观念，所以我们今天重新研读它，仍有很重要的意义。

二、这部《四书》皇家读本，是明代万历初年（1573—1582年）大学士张居正为年仅十多岁的小皇帝朱翊钧讲读《四书》的讲本。由张居正领衔和翰林院的讲官轮流为小皇帝讲解，讲解之后进行修改，再进呈给皇帝，让他课余时间在内阅读。由于朱翊钧还是小孩子，所以这个讲本是用明代最通俗的白话文写成的，既深入浅出，又通俗易懂，而且很贴近生活，是一部很具时代特色、老少皆宜、雅俗共赏的《四书》读本。此书原名《四书直解》，其中《大学·中庸》3卷，《论语》9卷，《孟子》14卷，共26卷。

三、当时皇帝读书称为“日讲”，先读《四书》，次读经书或史书，《四书》先从《大学》开始，经书先从《尚书》中的《虞书》开始，史书先读《通鉴》，次读《贞观政要》等。这些讲本先后编撰成书的除了《四书直解》而外，又有《通鉴直解》、《书经直解》。《通鉴直解》我们已于1998年整理出版，取名《张居正讲评〈资治通鉴〉皇家读本》，很受读者欢迎。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，普及古典读物知识，我们现将《四书直解》整理出版，分别取名《张居正讲评〈大学·中庸〉皇家读本》、《张居正讲评〈论语〉皇家读本》、《张居正讲评〈孟子〉皇家读本》，统称《〈四书〉皇家读本》，供广大《四书》爱好者阅读。《书经直解》也已整理出版，取名《张居正讲评〈尚书〉皇家读本》，也深受读者的喜爱。

四、此书虽是专为皇帝读书而编写的，但编成之后，即流传至宫外，成为当时社会通行的《四书》读本之一。到了清代，此书颇受康熙皇帝的称赞，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，他对讲官说：“讲章以精切明晰为尚，毋取繁衍。朕阅张居正《尚书》、《四书直解》，义俱精实，无泛设之词，可为法也。”（《清史稿·圣祖本纪二》）当时人将此书编成《四书直解说约》一书。所以整理此书

很有文献价值,此次整理根据南开大学馆藏清代前期刻本。

五、这次整理仍遵循《通鉴直解》的整理原则,对该书《四书》原文和直解(张居正讲评)部分进行新式标点,另《大学·中庸》有注释、译文(今译)、今评部分,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有注释、译文部分。注释是对《四书》原文和直解原文中难懂的字、词和典故进行简要解释;译文是只将《四书》译成现代通行的白话文;直解是明代通行的白话文,无需再译;今评是根据我们今天的理解,对《四书》原文和张居正的直解,进行一些分析和阐释,以期古为今用。

六、目前《四书》的各种注释本繁多,我们的注释、译文,尽量择优参考。但张居正的部分直解,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,我们的译文尽量予以采用。此书的重点在直解,它的内容较《四书》原文更为丰富,整理工作以一人之力断难完成,所以我们采取多人分卷工作,最后由主编修订统一定稿。为了方便读者阅读,特撰绪言作为导读。由于编者水平有限,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,敬希读者和大方之家批评指正,以期再版时改正。